

吕正惠 著

战后台湾文学经验

现代主义在台湾 七八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源流与变迁

世纪末台湾后现代思潮种种面相

台北人“传奇” 荒谬的滑稽戏

性与现代社会 不自主的小说家

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传统 战后台湾社会与台湾文学

我的“接近中国”之路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战后台湾文学经验

吕正惠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I209.958

L907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台湾文学经验 / 吕正惠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4

(当代批评)

ISBN 978-7-108-03354-3

I. 战… II. 吕…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台湾省
IV. I209.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3589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4月北京第1版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7

字 数 384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44.80元

序

两年前，经由贺照田等朋友的努力，三联书店愿意为我出版一本台湾文学的批评文集，我为此应该感到高兴。但实际上我一直迟疑不决，提不起劲来编这样一本书。我怀疑大陆读者是否需要这一本书，怀疑大陆读者是否能理解我所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一本书不是真的“必要”出版，还是不出较好。

我不是怀疑大陆读者的理解力，我是怀疑我的文章所具有的明显的时间、空间因素（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台湾）是否能引发大陆读者的兴趣。我在写这些文章时，所预设的对象只限于当时的台湾读者，它在流通上的不利之处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在这篇序里，我想谈一下本书的写作背景与写作动机，以便让大陆读者了解他面对的是怎样一本书。我希望大陆读者先读这篇序，再决定要不要买（或看）这本书。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书呆子，是台湾联考制度下的“好学生”。我唯一的反叛姿态是，在考大学时选择了文史，当时的好学生很少人这样做（他们选择理工或医科）。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并立志要当一个古典学者。从大学到博士，我读了十三年。我跟一般中文系训练出来的人有一个差别，我还私下读当代文学、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史等等杂书（台湾一般中文系出身的人大半只读古籍及相关著作）。

我读大学的时候，台湾还处于国民党体制下的戒严时期，像我这样不问世事，只知道读书的人都知道，不要谈政治，因为你会不小心触到禁区，不小心被打报告（你不知同学之中的哪个人是这一个人），不小心被捕、送到绿岛（政治犯关押地）。我大二时就听说，我喜欢的一个小说家陈映真被捕了，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哪一年才能出来。政治的高压让我

们喘不过气来，表面平静的读书生活其实无法掩盖当时许多知识青年内心的不满与苦闷。就这样，我在台湾大学过了七年（包括修硕士）。

硕士毕业后，我服两年兵役。由于我的硕士论文自己感觉不满意，同时意识到在当时台大中文系的气氛下我不可能被录取，我连博士都没报考（当时的博士考试只有口试，不需笔试）。这两年我过得很苦闷，因为不读博士，我就当不成“学者”了。我完全脱离社会，独自过了两年。

等我从军中回到社会，我发觉台湾社会正处在剧变的初期，整个社会非常骚动不安，反对国民党的党外政治力量明显在增强，反对国民党文化政策的乡土文学潮流正在高涨。那时候我前途茫茫，台大博士报了名，果然没考上，又找不到专任教师职位，只好到处兼课。内心的不平容易被外在社会所触动，我开始“关心社会现实”。

第二年我勉强挤上东吴大学博士班，但前途仍然堪忧，因为即使毕业仍可能找不到大学教书。读博士这六年，我生活过得极散漫，读各种党外政治刊物，偷读马克思，读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当然都是囫圇吞枣。博士论文写的仍然是唐诗（和硕士一样），但我知道，我的兴趣转变了。

后来我时来运转，由于几位师长的照顾，居然在博士学位没拿到之前就能到清华大学教书。其时，乡土文学论战已过，国民党使尽全力，未能打压文化界的反叛气氛，开始改变政策。那时，我已看出，国民党为了对抗乡土文学的关心现实，有意地提倡“纯文学”，即奖励描写善良人性的文学，以制衡乡土文学的过分干涉政治。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我步入了当代台湾文学评论界（一九八六年），那时候，我已三十八岁。

作为一个晚熟的反叛者，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不准关心现实，只能谈风花雪月，我以鲜明的立场批判当代台湾小说家的缺乏现实感。应该说，就是由于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我成为台湾评论界的一个特殊的边缘人，因为从来没有人以如此尖锐的语气批判台湾的成名作家。

这样的心态大概只维持了五六年，然后我发现，跟我同时代的反对国民党、支持乡土文学的知识分子（大半是所谓的本省人）好像都逐渐

转向台独思想，并且声称他们不是“中国人”，并且一再说出现藐视中国的话，我从大惑不解转为愤怒；而那些支持“纯粹文学”的人，又开始说，台湾已进入“后现代”社会，台湾需要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他们，我不屑一顾。这样，我从边缘人（反主流思想）成为一个孤独的人（因为反主流的人大半转为台独派）。就这样，我又写了十年左右的现、当代文学评论，但已没有什么读者，最后，连报刊、杂志都不愿跟我约稿，只能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不论是后现代主义者，还是台湾文学论者（台独派），都不读我的文章。他们说，我有政治立场，因为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文章有问题，好像他们都没有政治立场一样。坦白讲，我文章写得快，论点鲜明，容易读，但在台湾评论界，我却完全被故意遗忘了。

我发现我不能这样过日子，于是，时间一到，就从清华大学退休，让自己在台湾学术界“退居二线”，“悠游林泉”。当我还没决定以后如何“工作”时，在贺照田的大力推荐下，就有了三联要出版我的书的事。按两年前的心境（当时刚退休不久）来说，我一直拖着不肯编，可以说是处在一种“空白”状态。

从服兵役期满，到自清华退休，将近三十年，我一直夹缠在台湾的政治、社会现实之中，我的文学评论表面上是“学术”，其实是我过度热切的心灵轨迹。我一直告诉台湾读者，文学如果完全脱离现实，一定不可能是好作品；我也一直想说服我的台湾同胞，台独思想不但在历史上讲不通，而且在实际上行不通。因为这些评论极端的当下性格，我怀疑它们是否适合在大陆出版。因为长期的孤独和被漠视，我突然很想再回去搞古代文学，不想再去碰触这些我想逃避的东西，我迟疑着不肯编一本选集。

此外，我还有另一层顾虑，我怀疑我的文学观可以在当代大陆知识界找到多少“同好”。

我在一九八九年七月间第一次回到了日夜系心的祖国，感受到了一种沉重的气氛（但我仍然兴奋地注视着祖国的山川和一切事物）。一九九二年再度回来。一九九五年以后，每年至少到大陆一次（有时候一年三

次)。我不断地和大陆的各种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聊天，想要从极少的见闻中了解大陆。在台湾，如果有机会见到来访的大陆学者，我也尽量地掌握聊天的机会。我买了许许多多的大陆书籍，杂乱无章地阅读。我的印象虽然还是很浅薄，但还大致可以体会大陆知识界的主流气氛。

因为历史的原因，当代大陆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一直往文学（或学术）和政治脱钩的方向前进，不少人甚至认为应该完全斩断两者的关系。大陆学者多半向往某种“主体性”和“独立性”，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心情。但我觉得，让文学或学术不要和某种政治趋向紧密结合，并不等于文学或学术可以不用“关心”现实，可以完全“纯化”。这两者之间应该有所区别。我有时不免觉得，有些大陆学者似乎走得太远了，读他们的书，仿佛在太空漫游一般，两脚不能着地，让我心慌。

有一次，我和陈映真先生偶然与一位比我们两人都还年轻的大陆学者闲聊，他研究的也是台湾文学。我们两人愕然发现，凡我们不喜欢的台湾作家，他大半喜欢，他欣赏的正是文学的“纯正性”。我们越谈越激切，但谁也不能说服谁。谈话已经持续得够久了，最后只好在陈先生的叹息声中友好地结束。

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学者我大半认识，好几位还有深交。但一般而言，我和他们的关怀点似乎总有一些距离。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密切交流，但我总有一种淡淡的寂寞感。我热爱大陆，交了许许多多的大陆朋友，可我还是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不是地域上的，而是见解上的，不像在台湾那么苦涩，但有时候还是觉得，似乎我是站在近距离旁观我的朋友们在谈他们的看法。

就因为这样，我不免产生一种感觉，我的这些东西，难道真的需要在大陆出版吗？作为一个文人，哪一个人出书不感到高兴？但如果真的不需要，又何必一定要呢？我的前三本评论集，台湾都已缺书，但我一点也不想再出一本重编过的选集。新写的文章，我也没有编集成书的欲望。

三年前我认识了孙歌、贺照田、张志强和冯金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毫不吝惜的赞许，让我大感意外。这就逼迫我不得不走出退休后的空

白状态（我还蛮喜欢这种状态），想着自己应该积极一些，振作一些。我已决定回去搞古代文学，但为了报答他们，我应该把这本书编出来。

但要如何编呢？我也颇感困惑。如果一点也不修改，似乎不好；如果要修改，大改不如重写，小改不如不改，而且似乎不诚实。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位大陆学者的一本书。他的心情和我一样，最后他保留原貌，但有必要时，他在文章的前后加按语，有时候说明写作背景，有时候以现在的自己评论过去的自己。我就采用这种方法。另外，我以写作先后作为主要的编辑原则，必要时稍加归类，这样和前述的编辑方法配合起来，似乎更方便操作。

鲁迅每一本书的编序和后记我读了都很感动。写作好像是文人唯一可做的工作，自己既不免珍惜，又怀疑它是否有用，但每次编书又特别郑重其事，这实在是自我嘲讽，自己打自己嘴巴。

最后应该感谢三联书店，能够在三联出书，是我无上的光荣。并且，再一次感谢上面提到的四位朋友。

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五日

目 录

序 1

辑一

现代主义在台湾

——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 3

五十年代的现代诗运动 31

青春期的压抑与“自我”的挫伤

——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思 49

七八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源流与变迁

——政治、社会及思想背景的探讨 68

七八十年代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 80

八十年代台湾小说的主流 97

乡土文学中的“乡土” 112

世纪末期台湾后现代思潮种种面相 117

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

——方言和普通话的辩证关系 145

辑二

方思初探

——其渊源及其诗中的“自我” 165

黄春明的困境

——乡下人到城市以后怎么办？ 178

王文兴的悲剧

——生错了地方，还是受错了教育？ 188

台北人“传奇” 199

从山村小镇到华盛顿大楼

——陈映真的历程及其矛盾 209

附 陈映真与鲁迅 222

荒谬的滑稽戏

——王祯和的人生图像 231

自卑、自怜与自负

——七等生“现象” 241

吴晟诗中的自我与乡土 254

论四位外省籍小说家：白先勇、刘大任、张大春与朱天心 274

辑三

五十年代的林海音 291

八十年代台湾闺秀文学的社会问题	309
性与现代社会	
——李昂小说中的“性”主题	320
《迷园》的两性关系与台湾企业主的真貌	332
不由自主的小说家	
——评朱天心的两本小说集	339
三毛之死	
——台湾女性问题省思的一个起点	350

辑四

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传统	357
中国新文学传统与现代台湾文学	363
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	
——台湾文学“主体性”平议	371
台湾文学观念的发展	385
战后台湾社会与台湾文学	395

附录

我的“接近中国”之路	
——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	406

辑 一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撤守台湾以后，即发布“戡乱时期戒严令”（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七年才解除）。按照此一法令，国民党在五十年代初雷厉风行地肃清岛内倾向或同情共产党革命的人。根据今人的统计，因此而被整肃的人高达十四余万，包括至少三四万人被处死（当时台湾人口约六百余万）。同时，凡是“附匪”或“陷匪”的大陆作家、学者的作品一律禁止发行，这几乎根本铲除了五四以降一切的新文学遗产。在很长时期内，新文学的重要作家，台湾的国文课本只能选出胡适、朱自清、徐志摩寥寥数人而已。

在根本拒斥新文学遗产的背景下，国民党大力推行“反共文艺”，但这种文艺，只能依靠政治力量推动，不久即丧失生机。当时，国民党正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实行土地改革，走上“美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道路。与此相伴，美式西方现代观念开始在台湾流行起来。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以西方现代文学为模仿对象的现代主义文学即开始在台湾萌生，并在六十年代成为精英知识圈的主流文化。

以上是本辑前三篇文章的政治、社会背景。这三篇文章除了指出当时一窝蜂的“趋新”、“亲美”潮流外，更重要的是分析当时落后的台湾社会、沉闷的思想禁锢，如何和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结合，从而发展出非常独特的“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本辑最后一篇论现代小说批评的文章，也可以从这一背景加以理解。）

一九七〇年前后，台湾政治、社会开始剧变。剧变的原因，本辑第四、第五两篇文章（特别是第四篇）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个剧变，导致“现代主义文学”霸权的崩解，由此产生的新潮流，台湾称为“乡土

文学”，其名称导源于“回归乡土”的口号。这一口号，是反对此前盲目的“全盘西化”。事实上，这是一个要求回归当前现实，重视本身政治、社会问题的文化大潮流的一部分，它跟当时风起云涌的要求民主改革的政治运动是相呼应的。当时，我个人是完全认同这一运动的，但我认为，这一时期的作品，文学成就大多不高，这在第五、第六两篇文章中都有所分析。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后，台独运动逐渐冒出头来。它首先是借着改换“乡土文学”的“乡土”这一名称的具体内容来达到目的的。对于这一点，本辑第七篇文章曾对此加以检讨。此后，“乡土文学”之名即为“台湾文学”所替用，而坚持中国立场的反国民党文化人（以陈映真为代表），即被孤立出来。本书并没有专门论述台独派文学观的文章，但本书第四辑许多总述台湾文学发展道路的长文，基本上都是为反对台独派观点而撰写的论战文章，请参阅。

也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当台独派逐渐兴起时，因“乡土文学”而暂时没落的亲西方潮流也开始“借尸还魂”，这时已换上“后现代”之名，本辑第八篇即分析此一现象的发展及其政治含义。可以说，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的两大主流是“台独派”和“后现代派”，一个是积极地反中国，一个是消极地反中国，两者都表现了非常明显的亲美倾向（台独派还同时亲日）。如果对照当时的大陆状况来看，从一九八〇年代发展到一九八九，再从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五，只要回顾一下大陆思想界的状况，就可以体会，在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年代，要在台湾站稳中国立场是非常艰困的。

第九篇专论语言问题，我个人觉得，这是全书可能写得比较好的两篇（另一篇为开头论现代主义那一篇）。语言问题涉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不只限于台湾文学，特别希望得到大陆读者的反映。

现代主义在台湾

——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

一、本文的出发点

一九五三年，纪弦创办《现代诗》双月刊，三年以后（一九五六年），纪弦宣告成立“现代派”，这两个日期可以视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时期的起点。一九七二年，关杰明发表《中国现代诗人的困境》，第二年，唐文标跟进，发表了《僵毙的现代诗》，因而引发一场“现代诗论战”。四年以后（一九七七年），由于彭歌在《联合报》副刊连续攻击日渐抬头的乡土文学，一场牵涉更广的“乡土文学论战”终于爆发。现代诗和乡土文学这两次论战可以当作台湾现代主义文学霸权期的结束。所以总结地说，以现代主义为主导的台湾文学时期，大约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时间。

对于这一持续二十年的文学现象，我们可以完全从文学的角度去加以考察。譬如，我们可以研究台湾的现代派文艺和西洋现代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问：卡夫卡如何影响台湾现代小说、艾略特如何影响台湾的现代诗；我们可以探究，白先勇的《台北人》或王文兴的《家变》，如何从乔伊斯的作品得到启示，又如何加以变形等等。

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细致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只有这个工作做得全面而深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地看到，西方现代主义如何具体地影响了台湾五十、六十年代的文学。但是，如果只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台湾的现代文学，却也未必能掌握这一文学现象的某些整体精神。举个

例子来说，一般评论者都承认，西方现代主义是伴随着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而产生的^{〔1〕}；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产物。^{〔2〕}但是，台湾的现代主义呢？当纪弦在一九五六年宣告成立“现代派”时，台湾的农村经济刚要从太平洋战争的破坏中复苏，台湾的“经济起飞”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呢！那么，“先进”社会的文学如何移植到经济“落后”的地区呢？

我们当然不一定要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不一定要相信：“先进”社会的文学跟“落后”地区的文学一定会受制于各自的经济条件，而发展出不同的道路。^{〔3〕}但是，我们一定会感觉到，把“先进”社会极为独特的文学现象，移植到基本上还是农业经济的台湾，这中间不可能不存在着一些引人思索的问题。譬如六十年代台湾正流行存在主义时，就有人问：在西方的社会状况下，西方人产生了“人的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代的台湾难道也存在吗？这样的问法也许可以正面的加以回答，但你绝对不能说，这是一个“假问题”，问得没有意义。

因此，对于五十一六十年代流行于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如果只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探讨它跟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关系，并不一定可

〔1〕 本文将西方现代主义视为“既明事实”，而未在讨论之前加以界定或陈述。大致而言，西方对现代主义的综合讨论可分成两大类，较传统的论述或归纳现代主义的艺术特色，如意识流、超现实、蒙太奇、非人性化等等；或探讨现代主义的“历史背景”，如对实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反动、宗教的没落、弗洛伊德的发现、科学技术对艺术的影响等等。六十年代末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它对现代主义的阐释成为另一种主要模式。大致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批判的观点论述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影响，并从这里分析现代主义所以产生的原因。在评价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阿多诺），认为现代主义扮演了叛逆的角色，在批判西方社会上有积极的作用；而卢卡奇则认为现代主义只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病态，基本上是一种逃避。在意识形态上，本文采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评价上则较接近卢卡奇，对西方现代主义采取比较负面的看法。

〔2〕 一八七〇年德意志统一，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空前紧张的对立状态，从这一时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般称为帝国主义时期。

〔3〕 按，此处是一种虚拟的语气，是说，即使我们没有经济决定论的看法，我们也会感觉到文化移植背后的社会问题。事实上，本文在方法上相当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分析的影响，并非完全不相信“经济决定论”。

以了解这一文学现象的全部真相。我们还必须从宏观的、历史的、社会的观点去看待这一问题，才能掌握到其中的一些症结，才能看到这一文学现象较受人忽视的一些面相。

二、台湾现代文学与五四传统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第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割离。从表面上看，台湾现代文学跟五四传统好像有若干相连的地方，譬如对待中国古典文化与古典文学的态度。台湾“现代派”的发起人纪弦在有名的《现代派信条释义》里说：

我们是有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我们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4〕}

在台湾现代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关键地位的《现代文学》杂志，也在《发刊词》里说：

我们有感于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以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情感。所以，我们决定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5〕}

这里面的语气有强有弱，但摒弃中国古典传统的倾向却是一致的。就这一点而言，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好像是五四“打倒孔家店”精神的继承与最极端的发展（以纪弦“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一语为最佳代表）。

但是，这一点表面的类似，却不能够让我们断言，台湾现代主义和五四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除了西化和反传统之外，五四精神还具体地表现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表现为平民主义、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民族与爱国这一点当然不用多说，至于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引述几个主要理论家的言论来作为证据。

〔4〕 此一宣言，《现代文学》四十六期（一九七二年三月）曾转载，见89—90页。

〔5〕 《现代文学》一期（一九六〇年三月），2页。

在这方面，态度最为激进的是陈独秀。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里，以鲜明的旗帜标举“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6]：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除了陈独秀之外，周作人也曾在《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二文里，说明他对新文学的期待。^[7]从题目本身，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的主张的精神之所在。即使是较“保守”的自由主义一派的代表人物胡适，也具有这种浓厚的平民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色彩。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比较李白、杜甫两人之优劣时，说：

（李白）这种态度与人间生活相距太远了，……我们凡夫俗子终不免自惭形秽，终觉得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则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8]

我所以不惜篇幅把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再引述一遍，是因为台湾长期以来扭曲了五四运动的真相。在国民党数十年的教育下，五四新文学运动变成只是以“白话”代替“文言”的白话文学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也降低为“西化”与“反传统”，至于五四知识分子基于救亡图存所发展出来的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则完全被淡化了，甚至掩饰了。^[9]

[6] 《中国新文艺大系·文学论战一集》，68页，大汉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二版。

[7] 周氏二文见前引书264页与284页。

[8] 《白话文学史》，249页，胡适纪念馆，一九六九年。

[9] 关于五四运动的不同阐释与评价，可参看Chow Tse-tung（周策纵），*The May Fourth Move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Ch.14，周氏的论述虽然尽量“持平”，但已可看出台湾对五四运动的阐释有所偏颇。